

宋蜀刻本《唐六十家集》考辨

程有庆

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时代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许多唐人文集湮没不存，而流传下来的作品，有不少也是残缺不全，给我们今天研究唐代诗文带来很多不便。南宋末期，临安陈解元书籍铺刊刻了不少唐人文集（现仅有零种流传），为传播唐集做出了一定贡献。然而，在陈宅书籍铺刻本之前，还曾出现过一部蜀刻本《唐六十家集》，此书现今是否存世，尚无确证。因此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索，不当之处，请专家、读者予以教正。

“唐六十家诗集”一名，始见于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（卷五），但未说明是什么版本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六指明此书为蜀刻本，他在著录《王右丞集》时说：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但尽管这部总集卷帙庞大，有关它的文献记录却寥若晨星。除王楙、陈振孙而外，只在明代杨士奇等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十见到有两套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的简单记载。《文渊阁书目》所录之书，均“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”，多是宋元旧本。故所谓《唐六十家诗》，有可能就是《唐六十家集》的异称。

蜀刻唐人集现今尚有流传，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曾作过总结性的说明：“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。一为十一行本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骆宾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诘三集。一为十二行本，约刻于南宋中叶。除上举孟浩然、李长吉、郑守愚三全本，

孟东野、元微之二残本外，尚有欧阳行周、皇甫持正、许用晦、张承吉、孙可之、司空一鸣六全本，与刘文房、陆宣公、权载之、韩昌黎、张文昌、刘梦得、姚少监七残本，总得十八种。此十八种唐人集，元时为翰林国史院官书，清初均为颍川刘体仁藏书，其时闻尚存三十种。别有王无功、张说之、杜荀鹤三集，均见前人著录，惜不传。”在这两类蜀本唐集中，顾广圻认为十一行本即是陈振孙所说的《唐六十家集》本。他在《思适斋书跋》卷四的《王摩诘集跋》中说：“右《王摩诘文集》十卷，每卷有‘二泉主人’、‘听松风处’、‘子京项墨林鉴赏章’、‘宋本’、‘甲’等印。第五卷有款云‘袁褰观’及‘袁氏尚之’印，今藏艺芸书舍。与前收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载《王右丞文集》皆宋本，而迥乎不合。予读《文献通考》引《书录解题》云：‘建昌本与蜀本次序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，而此集编次尤无伦’，乃悟题‘摩诘集’者，蜀本也；题‘右丞集’者，建昌本也。建昌本前六卷诗，后四卷文，自是宝历二年表进之旧；而蜀本第二以下全错乱，故《直斋》以为“尤无伦”也。①又读洪迈《万首绝句序》云：‘如王涯在翰林同学士令狐楚、张仲素所赋《宫词》诸章，乃误入《王维集》。’其王维诗后注云：‘别本维又有《游春词》等十五篇并五言十五篇，皆王涯所作，今以入涯诗中。’按蜀本第一卷末有此各篇，但诗前标翰林学士知制诰王涯名，盖其始抄缀于此，而刻者不知删去耳，亦未误为维诗如洪所见之别本也。至《直斋》所称蜀本《唐六十家集》，世无完书，大兴朱氏椒花吟舫有若干家：《权载之》五十卷，嘉庆某年刊行，《张说之》三十卷，江都汪孟慈为予写其副。其余闻尚有《王子安》等而未审。他则《李太白》三十卷，康熙中缪氏刊之；《骆宾王》十卷，曾在小读书堆，后刊于扬州。二书真本，俱归艺芸。今又收此，独于秘籍深有宿缘，良可羨已。去岁，以建昌本见借，得影抄一部，兹承示蜀本，遂加对

勘，除次序外，其多寡异同，亦互有短长，拟合成定本，再奉质正也。”这段跋文讲得很详细，读过之后，似乎不应再有疑议。文中提到的《王摩诘》、《李太白》、《骆宾王》三集，即是现存的十一行蜀刻本。但顾氏说它们与《权载之》、《张说之》、《王子安》同出《唐六十家集》，则不知所据为何。如依顾氏所说，上述《王摩诘》等六种书属《唐六十家集》本，那么《张说之》《权载之》的版式就应该与十一行本相同。可是，朱筠原藏《张说之文集》究竟是十一行本还是十二行本，却有不同说法。缪荃孙《张说之文集跋》云：“刘燕庭曾藏宋刊三十卷本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与李太白、骆宾王等集同行款，考为蜀本，自朱竹君椒花吟舫散出，为燕庭所收，今又不知归于何所。”（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七）但据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二说：“旧传朱竹君家曾藏宋刊三十卷本，行款与权载之、司空表圣诸集同，号为蜀本。后归刘燕庭，今已不可踪迹矣。此三十卷钞本为邢君赞亭新得诸临清徐氏者，行款与蜀本同。钤有朱竹君印，其为朱氏椒花吟舫据家藏宋本传录者断然无可致疑。”傅氏所说的三十卷本《张说之文集》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原书每半叶十二行，每行二十一字，钤有“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”、“朱锡庚印”、“汪喜孙印”、“孟慈”、“星伯曾观”等印，显然即为顾千里所说的“汪孟慈为予写其副”之本。由此可见，朱竹君并没有藏过十一行本《张说之文集》，倒是顾千里、缪荃孙将十二行本误作十一行本，把两种蜀刻本混为一谈了。至于嘉庆十一年（公元1806）朱珪刊印的《权载之文集》，同样是出于十二行蜀本。杨绍和《楹书隅录初编》卷四说：“五十卷之原帙久佚不传，近只渔洋《居易录》称无锡顾宸有藏本，刘体仁之子写之以赠，而其书亦不存。乾隆间，大兴朱竹君学士得旧钞全本，彭文勤公从朱文正公假之，亲为校勘，于嘉庆丙寅重付剞劂”。傅增湘曾见一抄本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五十卷，十二行二十一字，盖

有“鄂氏顺安珍藏”、“结一庐藏书印”、“朱子清”、“臣澂印”、“臣澂私印”、“字曰子清”等印。他说：“此书似乾嘉人笔迹，疑即朱笥河家照宋蜀本传录者，嗣为朱子清所得，即《结一庐丛书》本据以入木者。据朱石君刻权集序，言竹君旧藏宋刊本，得之陶氏五柳居，陶得书日自抄一部，其后询其姪少河索观原本，亦抄存一部以假之彭文勤，彭又录副。当时海内只此四部，此必为传钞三部之一。彭本余曾手校，则此帙非陶即朱耳。”（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二）由此足证顾氏所言之误。

顾广圻在没有区分两种蜀刻本之前，就断言某书是《唐六十家集》本，未免有些草率。那么，会不会《唐六十家集》包括十一行和十二行两种版式呢？从刊刻时间看，十一行本《骆宾王文集》《王摩诘文集》《李太白文集》的“构”字均有避讳，当为南宋绍兴间刻本。杨绍和称这些书为北宋本（见《楹书偶录》卷四），显然失误。至于十二行本，陆貽典、钱曾认为刻于北宋，黄丕烈认为刻于南宋初^②；实际上《刘梦得文集》、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、《皇甫持正文集》的“敦”字均已避讳，故当是光宗绍熙以后刻本。由于这两种款式的蜀本唐集刊刻时间相差至少有四、五十年，因而也就排除了它们同为《唐六十家集》的可能性。

现存的三种十一行本，其内容不仅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有关蜀本的记载相合，而且和《郡斋读书志》的记载也相同。如《李太白文集》三十卷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著录《李翰林集》时说：“近蜀本又附入左县邑人所哀《白隐处少年所作诗》六十篇，尤为浅俗。白天才英丽，其辞逸荡隽伟，飘然有超世之心，非常人所及，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。”查《李太白文集》第二十四卷，收录了闺情诗和哀伤诗六十二首，当即晁氏所怀疑的伪作。晁公武字子止，绍兴二年举进士，后官至吏部侍郎。《郡

斋读书志》一书，始编于绍兴年间。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有晁氏绍兴二十一年（公元1151）自序，足见其所言“近蜀本”，即指十一行本《李太白文集》无疑。赵希弁《郡斋读书志·附志》补录《李翰林文集》三十卷云：“右唐李太白之文也。《读书志》云二十卷，希弁所藏三十卷。以常山宋敏求、南丰曾巩序考之，则三十卷为是。然第一卷乃李阳冰、魏颢、乐史三人作序，李华、刘全白、范传正、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，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。”现存十一行本内容与赵氏所言全相吻合，可证晁、赵所见同为一书。

现存十一行蜀本，由于数量太少，因而很难肯定它们是否就是《唐六十家集》的零种。何况，“唐六十家集”一名见于南宋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中有关蜀本《钱考功集》、《李文公集》、《会昌一品集》、《卢仝集》、《笠泽丛书》等书的记述，与《郡斋读书志》不同，故而晁公武似不曾见到《唐六十家集》。无论从刊刻时间还是从传本数量上说，十二行本显然都比十一行本更具有是《唐六十家集》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摒弃旧说，给予十二行本以足够的重视。

旧传刘体仁（公馘）家藏蜀本唐人集三十家。傅增湘的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十二中《宋蜀本〈司空表圣集〉跋》说：“今此本卷数标题悉合，其雕刻刀法断为蜀工，是陈氏（振孙）所称蜀本即是刻也。昔王渔洋言“‘刘公馘家有宋刻唐诗三十家，今卷中刘氏印记宛然，自属公馘藏本。’”现存十二行本唐集，各本均盖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刘体仁印”、“颍川榴考功藏书印”等印章，显系刘公馘原藏之书。此书主要以作者的字作为书名，如《孟东野文集》、《李长吉文集》、《皇甫持正文集》、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等，其题名方式与十一行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、《王摩诘文集》相同，在宋刻唐人文集中较为特殊。

然而，人们对其中某些书是不是蜀本尚有不同看法。如袁克

文在《皇甫持正文集》后跋曰：“此宋刊审为南宋所刊唐人文集之一，黄堯翁藏宋刊刘文房、孟东野诸集，与此刊正同。予同时得权文公、元微之二集残帙，亦同一刊本，俱有‘明（当作元）翰林国史院官书’印，此刊虽系建坊间刊刻，而皇甫集已成孤本，视他集尤足宝贵……”。再如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，王国维、张元济均说是建安书肆所刊；^③《刘梦得文集》，屈守元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卷》都说是建安刻本^④。足见其版本问题十分复杂，还需我们做一些细致的甄辨。

上列各书之所以被认为建安刻本，就因为它们自身存在着某些建安刊刻的痕迹。如《刘梦得文集》，虽然日本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十行蜀本与之题名相同，但卷第次序却有较大差异。而以浙本《刘宾客文集》与之相校，内容编排全都一致，因此被断为建安刻本。^⑤再如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，因书前有一篇宣和甲辰（六年，公元1124）建安刘麟写的序文，也被视作建安刻本。

但是，考定一部古籍的刊刻地点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为前人刊印古人的著作，必须选定一种底本据之雕刻，所以不管是蜀本、建本或是其它版本，都有可能被选作底本。如《李太白文集》，陈振孙依据书末毛渐题识，考定推出“蜀本盖传苏本，而苏本不复有矣”的结论。因此，对待那些年代久远的宋元本来说，既不能仅凭序言断定它的版本，也不能因其内容符合某种版本而就认定该书即是某本。拿元稹集来说，洪适在乾道四年（公元1168）曾刊刻《元氏长庆集》六十卷，书前即有建安刘麟的序文，可是刻书地点却不在福建建安而是在浙江的绍兴，故称浙本。据说浙本乃依照宣和六年刘麟本覆刻，故应属建本系统，但它决不是建本。而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的内容、文字与浙本有相异之处，疑非出自建本，只是采用了建安本的刘麟序言而已。

类似的情况还不止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一书，《许用晦文

集》卷二后，也有一段校语，末署“政和辛卯（政和元年，公元1111）吴门升平地弟水轩方回手校”。可知此本源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的贺铸刻本。贺铸字方回（1052—1125），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）以承议郎致仕后，定居苏州直至终老。贺铸在苏州曾校刻了不少唐人文集，许浑的《丁卯集》即其中之一。但此《许用晦文集》显然不是贺氏原刻，而是据之重刻的另一种本子。

正因为十二行本依据各种旧本刊刻，所以陈振孙才会看到两种完全相同的《李太白文集》。他说：“别有蜀刻大小二本，卷数亦同。而卷首专载碑序，余二十三卷歌诗，而杂著止六卷。”

“有宋敏求后序”，“末又有元丰中毛渐题。”（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《李翰林集》条）现存十一行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，第一卷为碑序，第二至二十四卷为诗，第二十五至三十卷为文，内容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完全吻合。从版框来看，十一行本比十二行本要小一些，因而陈振孙所说的大本，当指十二行本；小本，当指十一行本。这两本当中，应有一种是《唐六十家集》本。

究竟十二行本是不是《唐六十家集》呢？陈振孙既然指出该书“多异于他处本”，我们不妨结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的有关著录，再做一些论证。

《刘文房文集》十卷 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卷数同。陈振孙云：“诗九卷，末一卷杂著数篇而已。”又说：“建昌本十卷，别一卷杂著”。足见建本为十一卷。现存《刘文房文集》为残书，仅存五至十卷。卷十内容正是数篇杂著，卷末还盖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印，显然已是书尾，可证其为十卷本。此书曾经瞿镛所藏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题作十一卷，显系失误。宋代刘长卿集只知有蜀本和建昌本两种，既然它是十卷本，当为蜀本无疑。

《孟浩然文集》三卷 《郡斋读书志》作《孟浩然诗》一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《孟襄阳集》三卷，“宜城王士源序之，凡二百十八首，分为七类。太常卿韦缙为之重序”。《孟浩然文集》前有王士源序和韦缙重序，同于陈振孙所言，而与晁氏藏本不同。

《李长吉文集》四卷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李贺集》五卷，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李贺集》四卷《外集》一卷。
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《李长吉集》一卷，“一”字显然有误。实际上李贺歌诗只有四卷本和五卷本两种。薛季宣《浪语集》卷三十《李长吉诗集序》说：“右李长吉诗集四卷，蜀本、会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，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。蜀本不知所从来，姚氏本出秘阁，宣城本出贺铸方回家。”又据吴正子《昌谷集笺注》说：“京师本（有庆按，即秘阁本）无后卷，有后卷，鲍本也。……今余用京、鲍二本训注，而二本四卷终，皆二百一十九篇，与姚、蜀本同。薛（季宣）谓宣城本二百四十有二首，盖多馀本二十有三耳。今鲍本后卷二十有三篇，适于宣本所多之数合，是鲍本即宣本也。”可见有《外集》一卷的宣城本为五卷本，而无《外集》的蜀本为四卷本。《李长吉文集》卷四末盖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印，当系完书。因此，它应该出自蜀本。

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 其中五至七卷、十七至二十四卷、《外集》一至十卷均为抄配。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韩愈集》四十卷，集外文一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昌黎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。陈氏云：“《顺宗实录》五卷列于史官，不在集中，今实录在外集”。所言与此本相合。

《刘梦得文集》三十卷《外集》十卷 残存一至四卷。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刘禹锡梦得集》三十卷《外集》十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《刘宾客集》，卷数同。陈氏曰：“常山宋次道裒辑其遗文，得诗四百七篇，杂文二十二篇，为《外集》。

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”。按残蜀本的内容编次与十行蜀本不合，而与绍兴八年刊刻的浙本相符，因疑此本源自浙本，非出建本。

《孟东野文集》十卷 残存一至五卷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作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《孟东野集》十卷。陈氏且云：“惟末卷有书二篇、赞一篇，余皆诗也。”据残宋本目录，卷十末正是书、赞，与陈氏所言相合。

《张文昌文集》 残存一至四卷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崇文总目》著录《张籍集》七卷，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张籍诗集》五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张籍集》三卷，且云：“川本作五卷。”又著录《张司业集》八卷《附录》一卷和《木铎集》十二卷。三本相比，八卷本收诗较多。而三卷本晚出，内容当据五卷本而来，它收诗约三百八十首。《张文昌文集》的四卷内容几乎全在其内，然尚缺诗约七十首，当即原书所佚的第五卷内容。由此可以说明，《张文昌文集》为蜀刻五卷本。

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五十卷 残存一至八卷、二十一至三十一卷、四十三至五十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题《权丞相集》五十卷，且云：“序又言九年掌诰，自纂录五十卷，不在此集内，今之未见。”所言与今存宋本杨嗣复《权载之文集序》相合。

《陆宣公文集》二十二卷 残存一至十二卷，而其中的十一、十二两卷还是抄配。《郡斋读书志》题《陆贽奏议》十二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陆宣公集》二十二卷。赵希弁《郡斋读书志·附志》录有《陆宣公文集》二十二卷，内容为《制诰集》十卷，《奏草》六卷，《奏议》六卷，与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宋刻《唐陆宣公集》内容相符。残宋本存有目录，其篇目次序与《四部丛刊》本皆相合，然不分类。因此，蜀刻残本可能来源于赵希弁所见之本。

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六十卷 残存一至十四、五十一至六十卷。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卷数同。洪适刻

《元氏长庆集》跋曰：“传于今者，惟闽、蜀刻本为六十卷。”此本与洪氏覆刻闽本的浙本不同，它的“乐府诗”在五至八卷，且无《外集》一卷，浙本的“乐府诗”在二十三至二十六卷。卢文弨曾见一题为“新刊元微之文集”的宋刻全本，其内容编排全同于此本，唯文字有些差异（见《群书拾补》卷九）。傅增湘以为卢氏所见为浙本，实则属于另一刻本，或许就是洪适所说的那种蜀刻本。现存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，极有可能是据旧蜀本刊刻。

《皇甫持正文集》六卷 《郡斋读书志》作《皇甫湜文》六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《皇甫持正集》六卷，陈氏云：“今集才数十篇，碑不复存，意其多所亡逸”。《皇甫持正文集》共收杂文三十八篇，碑文仅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一篇。

《欧阳行周文集》十卷^⑥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俱作十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则云《欧阳行周集》五卷，“五”字当为“十”字之误。据李贻孙《欧阳詹文集序》云：“太和中，予为福建团练副使，其子偃自南安抵福州，进君之旧文共十编，诗凡若干首，泣拜请序，予以诺其命矣，而词竟未就”。可证原书作十卷。除十卷本《欧阳行周文集》之外，又有八卷本《欧阳先生文集》流传。从内容说，二本区别不大。只是十卷本诗不分体；八卷本诗分五、七言古诗、律诗、绝句等，赋多《秋月赋》一篇，显然晚出。然而傅增湘《跋欧阳行周集》说：“盖此集宋时有二本，一为八卷，一为十卷。十卷本在蜀中，晚出。”所言失当。

《姚少监文集》十卷 残存一至五卷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俱题《姚合集》十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姚少监集》十卷，并云：“川本卷数同，编次异。”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抄本《姚少监诗集》十卷，末有毛晋手跋云：“此浙本也，川本编次稍异。”毛氏跋后又有黄丕烈手跋云：

“余向藏姚少监集止五卷，残宋刻也。顷从小读书堆收得毛子晋旧藏姚集，前五卷审是明人抄本，后五卷似是后来抄补，不知与前五卷是一是二否……今取残宋刻本对之，果异。盖相传宋刻是蜀本，当即子晋所云川本；而与此之川本异者^⑦，宜其说之合也”。现存《姚少监文集》残宋本，原即黄尧圃收藏者。其不同于他本，已经前人所证。

《张承吉文集》十卷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皆著录《张祜诗》一卷，唯独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《张祜集》十卷。《张承吉文集》与早期传本的卷数差异非常明显，一经发现，即被影印出版，受到研究者的特别注意。

《许用晦文集》二卷《拾遗》二卷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均题《丁卯集》二卷，《崇文总目》作《丁卯集》三卷。许浑的两卷《拾遗》诗，是贺铸“求访二十年”获得的成果。据贺方回自己说，曾校白沙沈氏本增多三十七篇，京口沈氏本增多五篇，华亭曾氏本增多六篇，又从《拟玄集》增多十一篇，《天竺集》和《本事集》各增多一篇。原本在政和元年刊于苏州，《郡斋读书志》已有著录。《许用晦文集》题下又标作“丁卯集”，系据贺铸本重刻。陈振孙说：“蜀本又有《拾遗》二卷”，当指此本无疑。

《孙可之文集》十卷^⑧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均著录孙樵《经纬集》三卷，只有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孙樵集》十卷。据书前孙樵《自序》云：“遂阅所著文及碑碣、书檄、传记、铭诔，得二百余篇，彙其可观者三十五篇，编成十卷。”可证原书应作十卷，陈振孙云：“自为序。凡三十五篇，盖其删择之余也。”与《孙可之文集》情况相符。

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十卷 题下标作“一鸣集”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均题作《一鸣集》

三十卷，卷数与之不合，当为全集本。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前有司空图《自序》云：“因据拾诗笔，残缺亡几，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其前集，庶警子孙耳。”然而书中计收杂著八卷，碑二卷，并无诗歌，说明序言非为此书而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误以为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即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记载的《一鸣集》，实际上二书有所不同。《一鸣集》乃唐时旧本，今已不传；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则可能出现于南宋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说：“蜀本但有杂著，无诗。自有诗十卷，别行”。可见记录的正是这个本子。

《郑守愚文集》三卷 题下标“雲台编”。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雲台编》三卷，与此本相合。

《杜荀鹤文集》三卷 卷端下题“唐风集”。此本即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所谓“惜不传”者，藏上海图书馆。^⑨《崇文总目》著录《杜荀鹤诗集》一卷，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唐风集》十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唐风集》三卷。据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说：“余藏九华山人诗，是陈解元书棚本，总名《唐风集》。后得北宋本缮写，乃名《杜荀鹤文集》，而以‘唐风集’三字注于下。”又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九说：“《杜荀鹤文集》三卷，宋刊本，首行题‘杜荀鹤文集’，下题‘唐风集’。《杜荀鹤》汲古毛氏所刊用南宋分体本，此则北宋不分体者。以毛本相校，字句多而不同……卷后有陆氏勅先手跋云：‘世传分体《唐风集》俱出南宋本，余尝假钱遵王本校过，藏诸家塾。毛斧季新得沙溪黄子羽所藏北宋本，既未分体，且多诗三首，与世本迥异’。”由此可见，《杜荀鹤文集》为不分体本，它与陈宅书籍铺刊印的分体三卷本《唐风集》内容编次有所不同。

由以上所举例证，不难看出现存十二行本全都合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的著录，而且多数不同于其他版本。凡是陈振孙对蜀本特点加以记述的书，现存各本皆与之相同。这类现象不像是偶然

的巧合，而刚好说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记录的正是这套十二行本唐人文集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依据，推断现存十二行本就是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的零种。

综上所述，现今存《唐六十家集》十九种（另有《王无功文集》等几种抄本，亦承传于蜀本），总数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。除了这些传本以外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提到的蜀本还有：《曲江集》二十卷，《杜工部集》二十卷，《元次山集》十卷，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一卷《外集》一卷，《李文公集》二十卷，《会昌一品集》三十四卷，《钱考功集》十三卷，《卢仝集》二卷、《武元衡集》二卷等，可惜均未见流传。

由于《唐六十家集》依据各种旧本辑刻而成，因而内容比较可信。陈振孙为唐别集写提要时，十分注意参考这部总集。总结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的唐集著录，有这样三个特点：一、凡遇蜀本与其他版本内容相同的，按一种书处理，著录时不说明书的版本，如《刘宾客集》《唐风集》。二、只有一种版本的书，不管它是蜀本还是其他版本，著录时都不说明书的版本，如《张祜集》、《孙樵集》。三、凡遇蜀本与他本内容不同的，著录时均对蜀本特征加以说明，如《刘随州集》《张籍集》。因此《唐六十家集》的内容都保存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一书之中。但到底还有哪些人的集子，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。值得提出的是，现存十二行本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的其他蜀本，没有一种是一卷本的书，这无疑为我们探寻《唐六十家集》的佚本，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线索。

注：

①据陈铁民考证，南宋麻沙本实源于蜀本。详见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第五期《〈王维集〉版本考》一文。

②钱说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九《杜荀鹤文集》条及《读

书敏求记校证》卷四《杜荀鹤文集》条，黄说见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五《孟浩然诗集》条。

③见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董氏茭门别墅本《元氏长庆集》卷末王国维跋及张元济校记。

④见《四川师院学报》1977年4期《记残宋本〈刘梦得文集〉》一文。

⑤说残宋本为建本，没有提出直接证据，疑“观风望气”所致。

⑥现存十二行蜀刻本，《欧阳行周文集》和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四十三至五十卷一册，藏台湾省中央图书馆，《杜荀鹤文集》藏上海图书馆，其余均藏北京图书馆。

⑦“川”字疑为“浙”字之误。

⑧此本北京图书馆藏二本。一为刘体仁旧藏，一为汪士钟、杨以增递藏。

⑨详见沈津《记宋本〈杜荀鹤文集〉》一文，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年第1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